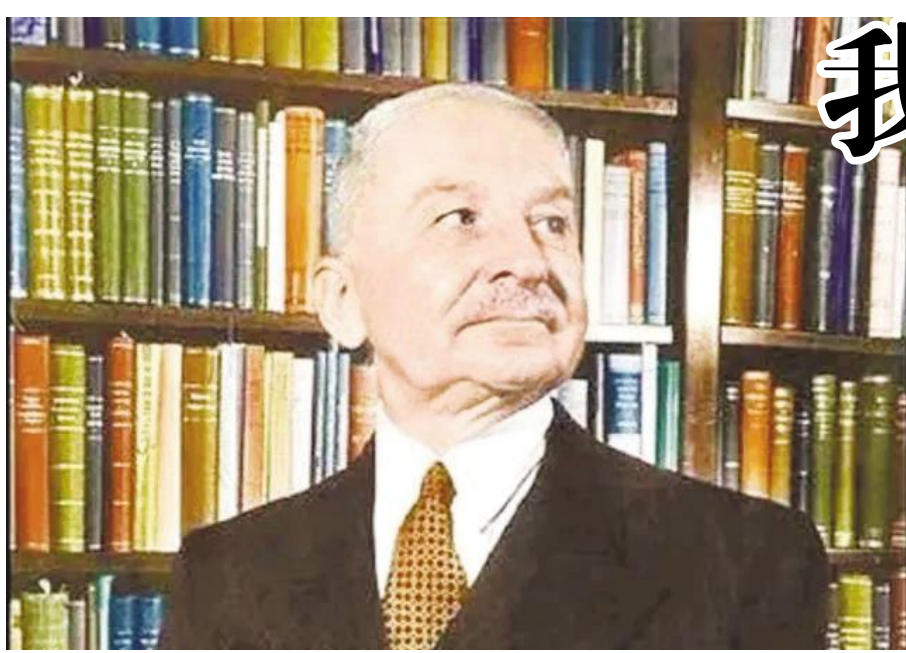


我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

■ 米塞斯



回顾我的工作,我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人在一个时代的全部成就中所占的份额的确很小,一个人的贡献不仅应当归功于他的先驱者和老师,还在同样的程度上归功于他的同事和学生。我知道美国的经济学家对我有多大的帮助,特别是自从我许多年前我的老师庞巴维克叫我研究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费特(Frank A. Fetter)和其他美国学者的著作之后,在我所有的活动中,美国经济学家对我的贡献的认可鼓舞着我。我也不会忘记,我还在维也纳大学做学生时发表了一篇关于奥地利劳动分工的著作,这是我对它感兴趣的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后来,第一位赞赏我的《货币和信用理论》一书的也是美国人,我尊贵的朋友安德森(B. M. Anderson)教授,他在1917年出版的《货币的价值》中提到了我的书。

货币理论

当我开始研究货币理论的问题时,存在一个普遍的信念,即现代边际效用经济学无法令人满意地论述货币理论。Helfferich是那些持有这一看法的人中最开诚布公的。他在其《货币研究》(Treatise on Money)一书中企图论证边际效用分析在建立货币理论时必然失败。这一挑战激励我运用现代边际效用的方法于货币问题的研究。这么做的时候我必须采取一种方案,它完全不同于数理经济学家们的试图建立所谓的交换方程式的公式的方案。在论述这样一个方程式时,数理经济学家们假定某个量(显然是方程式中的一个变

量)变化了,于是其他变量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方程式中的这些变量并非个人经济的项,而是整个经济体系的范畴,因此变化并不发生于个体而是发生于整个体系,发生于作为整体的国民经济(Volkswirtschaft)。这种推理方式明显是不符合现实的,而且与现代交换学(Catallactics,这是“研究市场现象的知识分支,也就是说它研究的是市场中谈判达成的物品和服务的交换率如何形成、这些交换率在人类行动中的起源及其对后来的行动的影响”,见Human Action, 232页)的方法根本不同。见向一种必然败坏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的工作的推理方式的回归。货币问题是经济问题,必然要用研究其他经济问题的方法来研究。货币经济学家不必论述总量,例如贸易总量或者整个经济体系中的货币总量;他更不能运用“流通速度”这样的含混比喻。他必须认识到,对货币的需求来自市场社会中个体的偏好,因为每个人都希望或多或少持有一些货币,于是存在对货币的需求。货币永远不单纯地存在于经济体系内,货币永远不单纯地在流通。一切货币都是某人的现金持有。任何货币都会在某一天从一个人的持有转变为另一个人的持有——有时候频繁,有时候不那么频繁。但是货币在任何时候都是某个人所有的,是某人的现金持有。个体关于其现金持有的数量、是否增加持有量的选择是购买力形成的最终原因。货币的供应或者需求的变化不可能同时在同样程度上作用于所有人,因此也不会同等地影响他们对价值的判断和作为买主卖主的

行为。因此,价格的变化并不同时在同等程度上影响所有的商品。初级的数量理论的公式和当代数理经济学家的公式都假定价格——一切价格——都与货币数量的增加或者减少成比例地上涨或者下跌,这是绝对错误的。

我们应当这么认识货币变化:它先发生于一个个体,然后缓慢地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直到最先受益的那些人的增加了的需求传达到其它阶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对货币变化的社会后果的符合现实的认识。

工商业循环

以此为出发点,我提出了一个关于货币和信用的一般性理论并且试图把工商业循环说明为信用现象。这个理论今天被称为货币理论,有时候也被称为奥地利学派工商业循环理论,这个理论使我对欧洲大陆的特别是德国的信贷体系提出一些批评。读者起初更加感兴趣于我对德国中央银行政策的趋势的悲观判断以及我的悲观预言——1912年时没有人相信,但是几年后实际情况比我预期的还要糟糕。经济学家的宿命就是,人们更感兴趣于他的结论而不是他的阐述,而且虽然经济学家指出了一个政策的不良的但是必然发生的后果,人们仍然不愿意改变。

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经济核算

我对货币和信用问题的研究后来导致我建立了奥地利工商业循环研究所。由此出发,我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核算问题。在我首次发表于1920年的论述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经济核算的文章中,以及后来在《社会主义》一书中,我证明了一个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制度不可能找到决定生产要素的价值标准,因而也不可能实行核算。自从我最初涉及这一点之后,出现了不同语言的几十本书和几百篇文章论述这个问题;这些讨论并未驳倒我的论点。我指出了核算是关键,这给予了与计划经济——当然是全面计划和社会化——相关的问题的数量以全新的方向。

存在中间道路吗?

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的比较研究使我注意到一个相关的问题:除

了这两个能够想像的社会合作制度——也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公有制——之外,是否还存在第三种可能的社会制度。这样一个第三种方案被其拥护者说成是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的,而是两者之间的道路,既避免了两者的缺点也保留了两者的优点。这样的主张被人们反复提出。我试图考察这些实行政府干预的制度的经济涵义,并且表明它们永远无法达到人们希望它们达到的目的。我后来扩展了我的领域以容纳国有公司(主义)的灵丹妙药。

人类行动

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论述使我感到有必要考察人类活动的价值和目的。我们不应继续容忍社会学家们指责经济学家们仅仅研究不现实的“经济人”的说法。我试图表明,经济学家从来不像那些批评家相信的那样狭隘。我们试图说明价格是需求的函数,它与那些从事交易的人们的动机无关。那些买家的动机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爱国的还是美国的都是无关紧要的。经济学研究的是达到目的的稀缺手段,与目的的性质无关。目的是理性范围之外的,但是自觉地致力于特定目的的人的每一个行动自然都是理性的。经济学是理性的并且研究理性,为此而谴责它是没有根据的。当然了,科学总是理性的。

我关于经济学理论的论著《(国民经济,1940年5月)几个月前在日内瓦出版,英文版即将出版(编者注:英文版是《人类行动》,Human Ac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9年,它是重新写的,而不是1940年的《国民经济的英文翻译》)。在书中,我不仅论述了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问题,也同样论述了所有其它能够设想的社会合作形式下的经济问题。我认为在一个经济组织的基本原理备受争议的世界里这样做是必需的。

我在论著中把静态均衡的概念仅仅看做工具性的,并且把这个纯粹虚拟的抽象作为理解不断变化的世界的手段。许多经济学理论家的缺点之一就是他们忘记了引入这个虚拟的概念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离不了没有变化的世界的观念;但是我们用它只是为了研究变化及其后果,也就是说研究风险和不确定

定性,也就是研究利润和亏损。

资本积累和利息理论

这个观点的逻辑结果就是对经济量的一些神秘解释的瓦解。资本这样的术语的几乎是形而上的用法就必须避免。从根本上说,没有什么事物对应于资本或者收入这两个词。存在不同的商品,生产产品和消费品;是个人和行动的团体的意图决定了一些物品是资本而另一些是收入。最大限度的保持或者新资本的积累永远是那些最大程度的节约以避免资本减少的的人们最有意识的行动的结果。假定资本是不需要特别关注的天然的不可变的事物是错误的。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反对我们时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芝加哥的奈特教授的见解。

庞巴维克的(资本和利息)理论的弱点并非——如奈特教授相信的——毫无用处地引进生产周期的概念。庞巴维克引入的所谓的生产率理论的错误才是更加严重的缺陷。与普林斯顿的费特教授一样,我致力于通过仅仅用时间偏好说明利息来消除这个弱点。

根据一个经常被引述的说法,任何经济学理论的试金石是其对工商业循环的论述。我不仅试图重申循环的货币理论,还试图表明所有其他理论的循环都不可避免地用了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当然了,景气意味着价格的上涨或者至少是下降趋势的减缓,说明这一点需要信用或者货币增长的前提。

经济学家的职责:挑战经济错误

在我的论著中,我随处都试图考察不同的制度因素和不同的经济数据的作用。我还讨论了其他经济学派提出的以及那些认为经济科学不可能存在的人们提出的反对意见。经济学家必须回应那些认为不存在普遍有效的关于社会的科学的人们。这些人否认人类逻辑和经验的同一性,试图用关于他们自己的阶层、国家或者种族的特定的观点取代他们所谓的超越国家的——按照他们的说法也就必然是空洞的——知识。我们无权听任这些说法横行,哪怕不得不重申在我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真理。但是有时候重申真理也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看到古老的错误不断再现。(彭定鼎译)

编者按:2018年10月23日,适逢兴业银行成立30周年、采纳赤道原则10周年之际,兴业银行在北京举办“寓义于利 绿色金融高峰论坛”,探讨推进绿色金融和中国经济的绿色发展。兴业银行行长陶以平、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别涛、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周诚君、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产业金融政策处处长李晓文等到会表示祝贺并发表演讲。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兴业证券公司副总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鲁政委博士在会上作了“有限世界里‘持续增长’的求索——宏观经济学中的绿色思想”的专题报告。以下为报告全文。

有限世界里“持续增长”的求索 ——宏观经济学中的绿色思想

■ 鲁政委

表,原油价格的上涨尤其惊人。这让当时的人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预感:是不是由于资源的约束,未来经济就此进入到一个真正受限制的时代?如此外推,那么,总有一天,资源会被人类耗竭。所以,《增长的极限》利用麻省理工学院开发的名为“World 3”的计算机模型,模拟出后的结果是:未来世界的人们无节制的耗用资源,最后因为资源枯竭,经济最终会全面失控和崩溃。这是罗马俱乐部著名的悲观预言。

这个“末日预言”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经济学家们的热烈讨论。其中,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诺德豪斯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指出,《增长的极限》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忽略了技术进步。随着未来技术的进步,总会不断有新的资源被发现,比如现在是原油,后来可以有核能,还可以有别的能源,所以他强调技术进步能够突破资源的约束。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他与罗默(Paul M. Romer)一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每年同时获奖的人,本质上都属于一个共同的研究领域(虽然并非每次一批获得诺奖的人,观点都一致),他们都是研究增长理论的,罗默是内生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他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知识或技术,而知识或技术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具有边际效益递增的特征。就像我看到过的有一个学者对罗默所做的一个非常妙的比喻是,人们如果按照过去一成不变的食谱把食材做成美食,能做的美食会受制于食材的多少,如果经济增长像一成不变的烹饪那样重复进行,原料最终会被用完,污染和其他副作用也会达到可怕的水平。但历史表明,经济增长的动力总会有更好的食谱,人们往往低估实际上使增长和新烹调技术的潜力,新的潜力实际上使增长表现为倍增而不是累加。

第二是忽视了市场机制。诺德豪斯认为,《增长的极限》里面的测算,更多的只是从物理上简单的外推,这样的确会导致资源的枯竭。但其实,在市场机制下,当越来越贵越来越少时,它就会变得越来越贵,越来越贵之后,大家就会用得更多,同时还会去寻找其他的替代品,技术进步或者罗默的菜谱更新很多时候就是在这里发生的。诺德豪斯由此把价格、市场引入到了环境问题方面。

至此,大家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吗?但问题来了,诺德豪斯认为市场会起作用,但市场总是能够很好地起作用吗?如果市场不起作用怎么办?恰恰在环境问题上,诸多时候都具有外部性,如果没有额外制度加以规范,市场就会失灵。

由此,90年代的经济学者越来越关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容量问题,第二个是政治意愿问题。对于前者,他们认为,未来人类面临的问题不一定是资源耗竭,而更可能是随着持续的污染排放,未来地球很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容纳各种工业废弃物的持续增加。对于后者,大家意识到,全球有这么多个国家,最终很可能会陷入不合作的“囚徒博弈”,没有政治的意愿达成对环境保护的共识。结果经济学家担心的这两件事情,的确现在都成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最难解决的问题。

诺德豪斯在1992年的研究也注意到了容量问题,他特别关注稳定性好、无法自动消失、很难被中和的二氧化碳,它会造成温室效应,全面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因此,碳成为全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但恰恰碳又是最具全球“外部性”的东西。在此基础上,诺德豪斯推出了以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为基础的“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简称IAM),用于定量测算碳排放的经济社会影响。之后,以此为基础的模型,成为了国际上气候定量分析的标准方法。其对碳排放后果的测算及其所展示的结果放在自流的悲观前景,直接促使了1997年全球第一个碳减排协议《京都议定书》的达成。《京都议定书》首次,在全球不同国家之间建立了碳配额交易机制,为碳排放权在全球进行交易做出了宝贵的探索。

而此后对全球产生巨大的影响的、于2006年发表的《斯特恩报告》,也是在“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简称IAM)“框架”的基础上,得出了“不断发展,其温室效应将严重威胁全球经济发展,加剧严重程度不亚于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亟需做出全球性反应以缓解这种变化”,其促成了非常有影响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巴黎峰会。至此,我们已经看到,宏观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对全球气候政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宏观经济学家们对环境问题关注的结果,是以Daly为代表学者提出了“环境宏观经济学”的概念。他们认为,环境宏观经济学不仅考虑到传统经济学中资源的有效配置、福利角度的分配的问题,还要沿着诺德豪斯的轨迹,考虑到全球是否能够有效处理工业的污染物、会不会超出全球极限的问题。Daly对经济学逻辑的扩展现在很容易理解,我们经常讲,市场就是不同主体之间公平的博弈,你讨价我还价,最后达成一致,结

果就是一个对所有人都不那么坏的结果。但是,市场机制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当事人的一方不在场怎么办?而环境关乎未来,环境不会讲话,未来不在当下,所以环境在市场的博弈中是缺位的,它需要有一个代人在,或者需要一种机制来纠正这一未来不在位的缺陷,这时,就需要政府来有效界定产权,确保市场失灵能够被纠正、能够回到确保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正常的轨道当中,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在‘有限’世界里‘持续增长’求索”的真正含义。

那么,环境宏观经济学要研究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是绿色经济的核算问题,我们需要看到现在的行为,如果不积极调整,未来会怎么样,如果进行了调整,未来又会怎么样?这包括如何在GDP核算中考虑环境问题,所以大家提出了不同的概念,比如生态需求指标、净福利指标、净国内生产总值指标等等。

第二个是绿色增长的问题。的确,人类的行为或多或少都可能对环境造成影响,完全没有影响似乎并不可能。我看到最近看到网上一些关于环境方面的自然科学研究发现,甲烷是继二氧化碳之后的第二大温室气体来源,而水稻是农作物中最大的甲烷排放源;同时,牛也是很重要的甲烷排放源,如果把所有的牛都放在一起组成一个国家,那么,“牛之国”将会是全球第三大甲烷排放国。如果是这样,那难道我们不种水稻,不养牛吗?结论可能不它有一个最佳的量。这就是绿色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范围。

▶▶▶ [上接 A1版]

中国经济不会陷入“滞胀”

第三,截至2018年8月份,中国生产者价格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率分别为4.1%和2.3%,通货膨胀率整体处在适度区间,近期并无现实的通货膨胀压力。而且温和的通货膨胀率事实上对经济复苏相对有利。社会各界比较关注的是近期全球石油价格上涨和中国发生的非洲猪瘟疫情所造成的预期猪肉价格上涨可能会给未来价格稳定造成一定的压力。我们认为通过宏观政策的积极应对,做到未雨绸缪,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对于未来通货膨胀造成的压力有限。从宏观政策来看,适度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石油价格冲击对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财政政策减税降费

我前面一直在讲,要确保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首先是要避免环境问题上的“市场失灵”,而经济学的共识是:纠正市场失灵离不开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如果政府提供的制度不足,就会导致具有正外部性的物品供给不足,而具有负外部性的物品过多。所以,诺德豪斯就提到,如果要在有限的世界里实现可持续的增长,政府应该选择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对于资源进行干预,具体他提了四个方面:

第一,要选择正确的干预领域;第二,要选择适当的干预水平;第三,要选择有效的干预工具;第四,要采取有效政策协调国际上的外部性。

比如,现在谈到绿色、环保,各方所提到的最多的政策不外乎是政府财政补贴或者税收减免。从外部性内部化的思维来讲,是没有错,但问题是,现在全球政府都现在越来越没有钱。在现实的操作中,最好能够有政府只出空头文件,不拿钱的办法。所以,马骏首席所提到的,我们能不能降低绿色融资风险的权重。我认为,我们值得认真考虑。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不可以进一步考虑:让绿色债权受偿权居先。这样就进一步保证了绿色融资的风险更低,确保了风险权重降低后,并不会加大银行在风险面前的脆弱性。如果我们让绿色的债权受偿权居先,就意味着让其他普通债权人承担或有风险。如果企业破产了,这些普通债权人会首先受到损失,那么,反过来会促使普通债权人想一想:如果这个融资不是绿色的,到底要不要做,反过来抑制了企业不绿色项目的融资。而让绿色债权优先受偿的合理性在于,民法的立法精神在于确保社会的“公序良俗”。有正的外部性的东西,使我们社会的每一个人都从中得到了好处,我们每一个为其承担或有风险,“公序良俗”内在一致。这就是一个非常靠谱的干预工具。这需要全国人大层面修改《破产法》。我国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如果能够最终实现这一制度创新,那么,将无疑是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又一历史性重大贡献。

也可以增强企业应对石油价格的冲击。对于稳定食品价格而言,通过扩大对猪肉等农产品的进口可以实现稳定价格预期的作用。

撇开咬文嚼字的“滞胀”概念,面对近期经济下行压力,中国的宏观政策也存在一定的调整空间。首先是协调“去杠杆”与总需求稳定之间的关系。短期内“去杠杆”与稳增长之间存在两难选择,应该系统地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其次,协调经济政策部门目标和宏观经济整体目标之间的冲突。例如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控制政府杠杆率之间的短期矛盾也需要协调。第三,货币政策应该立足于国内经济目标,为维持经济稳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完)